

《奥瑟罗》:一个西方“他者”的建构

张德明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是由意大利小说家钦齐奥的《故事百篇》改编而成的。但改编不仅是一个文体转换的过程,更涉及到政治文化权力与文本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原小说中无名的摩尔人被起名为“奥瑟罗”,故事场景从威尼斯到塞浦路斯的转换、主角命运从被判流放到刎剑自杀的安排等,体现了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英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剧作家创作动机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复杂的操作过程,《奥瑟罗》既建构起一个西方的“他者”形象,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满足了观众的愿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当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有关黑人的刻板印象,体现了剧作家超越种族、肤色和文化差异及包容一切的人文主义精神。

[关键词] 奥瑟罗;他者;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3)01-0111-08

《奥瑟罗》被认为“也许是莎士比亚所有剧本中最富争议性的[1]。自该剧上演并发表以来,相关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其中影响较大,且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大致有“嫉妒说”和“轻信说”两种[2](p.153)。上述二说对奥瑟罗悲剧成因的解释虽各有道理,但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作为矛盾冲突双方的黑肤的“摩尔人”奥瑟罗和白种的威尼斯人伊阿古各自的文化和种族身份。因为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和社会特殊主义(communitarianism)立场看,无论是妒忌还是轻信都不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而是与特定的、具体的、生活于一定时空之中、从属于一定种族与文化的个体相关的。

什么是文化种族身份?文化种族身份的核心是解决并回答“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向何方?”等有关个人的文化归属(包括社会性别、种族、民族等)问题。此类问题如能得到确切的、肯定的答案,那么,生活于特定社会中的个体就会具有身份认同感和生存安全感,反之,就会造成文化身份危机,产生孤独感和疏离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并由此引发剧烈的内心冲突,直至最终酿成悲剧。

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危机主要发生在移民和流亡人群中,这些人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或个人的原因离开自己的祖国,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定居,其间往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类似精神上的“断奶”过程,而最终能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则往往要视个人的性格、环境、机遇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定。

综观《奥瑟罗》全剧,主角的悲剧主要是因身份认同危机而产生的,而主角的身份及其认同危机本身又是被莎士比亚有意建构起来的,体现了16—17世纪之交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英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叙事文本生产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收稿日期] 2002-06-13

[作者简介] 张德明(1954—),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

一、从“摩尔人”到“奥瑟罗”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改编自意大利小说家欽齐奥(G. Cinthio, 1504—1573)的《故事百篇》(*Hecatommithi*)。从后殖民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叙事文本形式的改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体转换过程,更涉及到现实的事世性、政治—文化权力与作者创作动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欽齐奥的小说出版于1565年,是一部继承了薄伽丘风格的写实作品,写的是1527年罗马被掠后,10个男女航海逃至马赛时所讲的故事。有关摩尔人(即莎剧中的奥瑟罗)的故事是该小说第三类《夫妻互骗》中的第7篇。差不多在欽齐奥小说发表后的40年,莎士比亚开始动手写作《奥瑟罗》的剧本(1601—1605),而该剧单行本(即所谓“四开本”)的出版则是在莎士比亚去世以后(1622年或1623年)的事。该版本用的剧名全称是《奥瑟罗,威尼斯的摩尔人的悲剧》(*THE Tragedy of Othello, The Moore of Venice*)^[3] pp. 628—630。国内不少莎评专家没有看重这个较长的剧名,大多根据较后出的“对开本”为依据来翻译或研究这个悲剧。但实际上,“四开本”给出的这个剧名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点出了全剧的四个主要内容:该剧的剧种,主角的名字,主角的文化与种族身份,以及悲剧发生的地点,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伊丽莎白时代后期主流意识形态对剧作家创作动机的微妙影响。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主角的名字。原小说中,只有苔丝狄蒙娜有名字,其他三位男人都是无名的。所以《奥瑟罗》一剧中男主角的名字极有可能是剧作家给起的。那么,莎士比亚为什么要给原小说中的那个无名的摩尔人起名为“奥瑟罗”呢?国内一些学者从戏剧艺术角度考虑,认为戏剧人物越具体就越能抓住观众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共鸣,给主人公起名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4] p. 69。但这个回答只涉及到问题的一半,即为什么要给无名的摩尔人起名,而没有回答为什么要给他起“奥瑟罗”这个名字的问题。

西方最新的莎士比亚研究资料表明^[5],莎士比亚给摩尔人起奥瑟罗这个名字并非随便之举,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具有多重隐喻意义。首先,奥瑟罗(Othello)这个名字具有异国情调(foreignness),而且与当时伦敦正在热演的本·琼生的喜剧《性格异乎》(*Every Man in his Humour*, 1601)中的主角的名字“Thorello”相近。本·琼生剧中的那位主角也是新婚燕尔,非常关注其妻子的贞洁问题,是个妒忌心很重的男人。而“Thorello”这个词本身又是从意大利语“小公牛”(torello)一词变化而来,其暗示的动物性和好色、好斗性不言而喻。莎翁给剧中的主角起Othello这个名字,显然有意要使当时的观众发生一种从性格到语义的联想。其次,奥瑟罗这个词的前半部分还与“奥斯曼”(Ottoman)谐音,奥斯曼是当时正威胁着西方世界的土耳其穆斯林帝国的名称。给摩尔人起名为Othello,难免使人联想到那个黑脸的奥瑟罗本人也许就是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奥斯曼,一个野蛮人。于此可见,主角名字的设计已经点明了其所属的文化和种族身份,预先为全剧的文化冲突埋下了一个伏笔。

原小说对摩尔人的身世没作过多介绍,只说他“气度轩昂,善于用兵,为政府所器重”^[3] p. 633。经莎士比亚改编后的剧本突出了奥瑟罗前半辈子漂泊不定、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他经历过“最可怕的灾祸,海上陆上惊人的奇遇,间不容发的脱险,在傲慢的敌人手中被俘为奴和遇赎脱身的经过,以及旅途中的种种见闻,那些广大的岩窟、荒凉的沙漠、突兀的崖嶂、巍峨的峰岭”^[6];彼此相食的野蛮部落,和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1—3)^①。终于凭借自己的膂力,在威尼斯建立起自己的声名和地位,被元老院委以重任,成为一位将军。

①本文引用的《奥瑟罗》台词均用《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朱生豪译,方平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引用该剧台词时,只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依次注明幕次和场次,不一一注明页码。引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但实际上,这个来自东方的摩尔人始终是个“他者”,始终没有能够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被后者视为“我们”。从剧本开场伊阿古和罗德利哥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在整个威尼斯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摩尔人的偏见和歧视。两人谈到摩尔人时,用的措辞和隐喻多为动物性的意象,明显将摩尔人看作非人的异类。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分析,外来者要融入当地文化和主流社会,最便捷有效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叙事话语,在异族人心目中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身份,表明自己既具有作为人类的普遍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荣誉和尊严;二是与当地通婚,生下合法的后代,从而最终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奥瑟罗》一剧中,莎士比亚巧妙地让叙述与爱情在奥瑟罗身上融为一体。细读剧本,我们不难发现,奥瑟罗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个“不善言谈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而他的忠实的听者就是苔丝狄蒙娜。正是通过叙述话语,前者获得了后者的爱情,从而在一个陌生的社会中建构起自己新的文化身份。奥瑟罗自以为此后便可以融入白人主流社会,永远摆脱那种长期以来折磨着他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了。正因为如此,苔丝狄蒙娜对于这个黑皮肤的摩尔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而是代表了一种观念,一种理想和一种信念,使奥瑟罗相信自己所属的种族与其他种族同样优越,同样可以获得美丽的白种女子的爱情,生下合法的健康的后代。因此,爱情对于奥瑟罗来说,就具有了一种超越个人私生活,上升到当代“身份政治”般的象征意义。正因为爱情在奥瑟罗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载荷了如此丰富的文化—政治意义,那么,一旦失去这种爱情,用奥瑟罗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世界复归于混沌(Chaos is come again)”。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奥瑟罗心理中其实也有着脆弱的一面。白人种族优越的观念已经内化在他的心中,成为他的“阿克琉斯之踵”。显然,这个“阿克琉斯之踵”是剧作家莎士比亚有意植入的。在《奥瑟罗》的第2幕第3场中,奥瑟罗在拆开由伊阿古挑起的凯西奥和蒙太涅争斗时说的一番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难道我们都变成野蛮人了吗?上天不许土耳其人来打我们,我们倒自相残杀起来了吗?为了基督徒的面子,停止这场粗暴的争吵……

(Are we turned Turks? And to ourselves do that

Which heaven hath forbid the Ottomites?

For Christian shame, put by this barbarous brawl . . .)

(2-3)

在上述这段话里,奥瑟罗有意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与西方基督徒作了对比,将野蛮(barbarous)一词与土耳其奥斯曼联系起来,明显在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即他与这两个正在互相争斗着的白人一样,都是文明的基督徒,而不是异教徒,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正是从奥瑟罗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这种强调中,我们看出了他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文化认同意识、莫名的焦虑和内在的不安全感。

二、从威尼斯到塞浦路斯

上述种族身份与文化冲突问题,从莎士比亚为全剧设置的场景中也明显表露出来了。《奥瑟罗》一剧中,共出现两个场景,即威尼斯和塞浦路斯,试分而述之。

第1幕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威尼斯,威尼斯在当时是西方的一个理性、公正、秩序和富庶的共和国。但是,在剧本开始时,这个白人世界正面临着来自东方的“他者”——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据史料记载,土耳其于1570年攻略了这个属于西方的海岛。由于这场战争发生在狄齐奥的《故事百篇》出版5年之后,因此,原小说基本没有涉及到这个历史事件,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摩尔人统率军队前往塞浦路斯。而莎士比亚则有意将奥、苔爱情置于这个政治、军事大背景之下,仿佛在提醒观

众土耳其人的入侵仅仅是一个显性的、来自外部的威胁,此外,还有一个隐性的、来自内部的威胁,这就是奥、苔的情奔——一个生活在白人世界的黑人爱上了一个威尼斯元老的女儿,而后者已经欣然接受了这个“他者”的爱情,并瞒过自己的父亲而与黑肤情人幽会。剧本第一幕“船”的隐喻,暗示着在土耳其人登上海上的战船,向威尼斯的前哨塞浦路斯进发的同一天晚上,奥瑟罗登上了一艘“陆地上的大船”(伊阿古语)在东方的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逼近威尼斯共和国领土的同时,另一个来自非洲的黑人已从一个西方人手中夺走了一个白种女人。这样,战争与爱情,土地与女人,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应,暗示了全剧的主题和动机:西方世界正面临着失去土地与女人的双重威胁。苔丝狄蒙娜的父亲勃拉班修当着威尼斯公爵的面说的话,实际上表达了当时西方人的普遍焦虑和担忧:要是这样的行为(按即奥、苔情奔)可以置之不问,奴隶和异教徒都要来主持我们的国政了。(1-2)

从第2幕开始到第5幕终,全剧场景从威尼斯转到了塞浦路斯。从地理位置上看,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的最东端,远离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心,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仅隔一个海湾,因此,与其说塞浦路斯属于西方,毋宁说它更接近东方。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一个介于文明与野蛮、城市与荒野之间的边缘地带。莎士比亚将奥瑟罗的主要活动地点放在塞浦路斯,是否为了加强主角对土耳其奥斯曼性格的认同?是否暗示着奥瑟罗的性格和地位与这个海岛具有某种相似性或对应性,即介于西方与东方、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以便于表现他的内心冲突和文化身份危机?我们看到,在威尼斯,奥瑟罗性格表现出高度的自制,文明,有教养,并且如布拉德雷所说:“充满了诗意”、“具有浪漫秉性”(6 [pp. 186-198]),而到了塞浦路斯后,奥瑟罗性格中的非理性、不稳定、激情和鲁莽等都表露无遗。如第4幕第1场中,奉公爵之命从威尼斯来到塞浦路斯的罗多维科亲眼看见奥瑟罗动手打苔丝狄蒙娜及其他一些反常的行为举动时,就大惊失色地说:“这就是为我们整个元老院所同声赞叹、称为全才全德的那位英勇的摩尔人吗?这就是那喜怒之情不能把它震撼的高贵的天性吗?那命运的箭矢不能把它擦伤穿破的坚定的德操吗?”苔丝狄蒙娜也对人说:“我的夫君不是我的夫君。(my lord is not my lord)凡此种种,均说明无论是奥瑟罗的故友还是他的妻子,都看到了其身份和性格的前后不一致,并对此产生了认同危机,而这些危机都是在奥瑟罗抵达塞浦路斯后才发生的。

三、嫉妒、轻信与身份认同危机

在原小说中,摩尔人与苔丝狄蒙娜之间的爱情波折没有得到充分的刻画和展示,小说开始时俩人早已结婚。矛盾冲突主要是在旗官和苔丝狄蒙娜之间发生的。旗官私恋苔丝狄蒙娜而不得,以为摩尔人手下的上尉从中作梗,并以为苔丝狄蒙娜也爱上尉,故阴谋设计陷害两人,挑起摩尔人的妒忌,两人合谋将苔丝狄蒙娜用沙袋打死(3 [pp. 633-636])。然而,莎士比亚删去了伊阿古追求苔丝狄蒙娜的情节,突出了奥瑟罗与苔丝狄蒙娜之间的爱情波折,以及其后发生在伊阿古与奥瑟罗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将全剧主题上升到种族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的高度。

伊阿古陷害奥瑟罗的动机非常隐晦而复杂,既有对自己得不到升迁的不满,也有对金钱的渴求等等,但其根本出发点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动机。事实上,伊阿古才是真正的嫉妒者。他不甘心在奥瑟罗这个“黑将军的麾下充一名旗官”,他痛恨凯西奥占了副将的位置,甘心当摩尔人的手下;他嫉妒黑脸的摩尔人居然能获得一位美丽的威尼斯女子的爱情,发誓要拆散这对情人。而伊阿古之所以能成功地实施其阴谋,首先就在于他摸到了当时社会中最敏感的神经,知道当时整个威尼斯社会普遍存在着种族主义的偏见。他看出奥、苔婚姻的合法性是很成问题的,元老院只是为情势所迫而批准了这门不般配的婚事。伊阿古巧妙地运用了“种族主义的修辞”(rhetoric of racism),对勃拉班

修进行挑拨,使这位元老感到自己的女儿嫁的不是人,而是动物“一头老黑羊在跟您的白母羊交尾哩。”(1-1);并且,他的后代子孙也将因此而沦入动物群“您的女儿给一头黑马骑了,替您生下一些马子马孙,攀一些马亲马眷”“您的令媛现在正在跟那摩尔人干那件禽兽一样的勾当哩”。(1-1)。不仅如此,甚至连奥、苔幽会的旅馆也被赋予了一个半人半兽的名字——马人旅馆。马人(Sagittary)是希腊神话中半马半人的动物,用它来暗示奥瑟罗这位野蛮的摩尔人与一位文明的白种女性的结合,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正是在伊阿古的挑拨下,勃拉班修相信她女儿对奥瑟罗的爱情是不自然的,是后者施展了妖术和符咒的结果,故而大骂奥瑟罗是“恶贼”和“黑鬼”,一下子将自己对摩尔人的真实看法表露无遗。

其次,伊阿古的阴谋之所以成功,更在于他抓住了或者不如说触到了奥瑟罗内心中的“阿克琉斯之踵”——文化身份危机意识和内在的不安全感。的确,奥瑟罗在潜意识中始终对自己的出身、肤色和年龄存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担忧,而这一切都被伊阿古巧妙地由意识深层带到了意识表层。正如英国莎学专家阿利森·史密斯(Alison Smith)所说:“他(伊阿古)成功地使奥瑟罗将社会偏见内化于自己的内心”“;将自己对苔丝狄蒙娜的怀疑转向对自己的怀疑”[1]。细读剧本,我们发现,在没有被伊阿古挑拨以前,奥瑟罗无论是言语还是举动,都充满了英雄般的气概和诗一般的高雅的浪漫气质,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肤色、年龄和美丑问题,但从第3幕第3场以后,即伊阿古隐晦地和他谈到苔丝狄蒙娜可能对他不忠以后,他开始对自己的肤色和年龄关注起来,话语中不断出现与“黑”相关的意象:

也许因为我生得黑丑,缺少绅士们的温柔风雅的谈吐;也许因为我年纪老了……所以她才
会背叛我(3-3)

〔我的奔腾的热血〕像黑海的寒流,浪涛滚滚(3-4)……

我像地狱般漆黑!(4-2)

甚至苔丝狄蒙娜的不忠,也被他形容为“像我的脸一般黑”!并且因为自己的“黑”,奥瑟罗更深切地感觉到妻子的“白”。他想像全营的将士都搂过了她那雪白的肉体,他在扼死苔丝狄蒙娜前,在黑夜中看到了她那比白雪更皎洁,比雪花石更光滑的一身肌肤。

总之,伊阿古通过一系列的种族主义修辞,摧毁了奥瑟罗通过自己的叙述和爱情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感,使他深切地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肤色及其所属的种族,感觉到白种人的优秀和自己的低劣,相信苔丝狄蒙娜爱上他这个摩尔人是不自然的,爱上凯西奥这个弗洛伦萨人才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属于同一肤色和同一种族。

妻子的不忠意味着爱情的失败,而爱情的失败则意味着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的最终落空。这对奥瑟罗的打击是致命的。对于这个黑肤的摩尔人来说,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一种爱情,更是一种身份认同感,一种心灵的归属感。“要是上天的意思,要让我受尽种种的磨折;要是他用诸般的痛苦和耻辱降在我的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的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唉!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戟指笑骂的目标!就连这个,我也完全可以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枯竭了,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水!”(4-2)

明白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理解,奥瑟罗谋杀苔丝狄蒙娜的深层动机,既不是由于嫉妒,也不是由于轻信,而是出于一种因文化身份危机而引起的焦虑感。苔丝狄蒙娜的不忠,在奥瑟罗看来构成了一种对整个摩尔人的侮辱,对一个“他者”的爱情的蔑视,体现了一种白种人对非白种人、基督徒对异教徒的种族宗教歧视。正是为了恢复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民族的尊严,他才必须把自己深爱的女人杀死。

剧本末尾,罗多维科和奥瑟罗的一番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罗多维科 啊,奥瑟罗!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汉子,却会中一个万恶的奸人的诡计,我们该说你什么呢?

奥瑟罗 随便你们怎么说吧;要是你们愿意,不妨说我是一个正直的凶手,因为我所干的事,都是出于荣誉的观念,不是出于猜嫌的私恨。(5-2)

四、从谋杀者到悲剧英雄

但问题没有如此简单。奥瑟罗故事的结局,苔丝狄蒙娜的被杀和奥瑟罗的自杀还具有另外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动。

(一)在原小说中,杀害苔丝狄蒙娜是旗官与摩尔人俩人合伙的,而且是旗官先动手,用装满砂子的袜子将苔丝狄蒙娜打倒在地,然后再由摩尔人动手。这种安排显然不会令当时的西方观众满意:一个文明人怎么可能与一个野蛮人合伙来杀害另一个文明人呢?改编成剧本后,我们看到,作为“文明人”的旗官伊阿古退出了谋杀场面,只动口不动手,而让黑脸的“野蛮人”独自一人去完成残忍的谋杀行动,亲手将苔丝狄蒙娜活活扼死。这样安排既使伊阿古从野蛮的罪犯变成了一个文明的罪犯,也使奥瑟罗从谋杀行为的“从犯”变成了“主犯”,这样安排意在说明作为摩尔人代表的奥瑟罗虽已在白人世界生活多年,但还是蛮性未改,符合了当时西方已有的有关黑人或非洲人的社会刻板印象(stereotype)。据一位英国学者考证,差不多就在莎士比亚写作他的《奥瑟罗》的同时,1603年,伦敦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的威胁概要》(*Epitome of the Theater of the World*),该书图文并茂,描述了“野蛮人”的性格。其中说到摩尔人“非常固执,身体强壮,非常妒忌他们的妻妾,对加于他们的伤害很难忘记”[5]。这说明了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一般英国读者或观众对非洲阿拉伯人所具有的成见。上述两个文本相得益彰,均可归入“东方主义”话语之列,不管剧作家本人是否意识到,其传达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确定无疑的。

(二)原小说中,摩尔人在杀死苔丝狄蒙娜以后,没有当场自杀,而是伪装了一个因屋顶倒塌而压死苔丝狄蒙娜的现场,被发现后,押回威尼斯判终身流放,最后被苔丝狄蒙娜家族中的亲戚弄死。但改编为悲剧后,结局是奥瑟罗勇敢地承担起杀人的罪责,并在真相大白后,以自己的生命赎了罪。莎士比亚仿佛要让奥瑟罗通过自杀这个极具象征性的行为,对自我形象做一番新的叙述(就像他此前在元老院面前为自己的爱情辩护一样),在西方观众心目中建构起一个敢作敢为的、勇于承担责任的、高贵正直的摩尔人的形象,从而消解或部分修正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关摩尔人的刻板形象。奥瑟罗一直未能释怀的是“说出一个真实的我”(“speak of me as I am”)。而通过自杀这个行动,莎士比亚终于让他说出了这个“真实的我”。

奥瑟罗临死前说的一大段台词,可圈可点,值得反复咀嚼:

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不用说了。当你们把这种不幸的事实报告他们的时候,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本来的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你们应当说我是一个在恋爱上不智而过于深情的人;一个不容易发生嫉妒的人,可是一旦被人煽动以后,就会糊涂到极点;一个像印度人一样糊涂的人,会把一颗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产更贵重的珍珠随手抛弃;一个不惯于流妇人之泪的人,可是当他被感情征服的时候,也会像涌流着胶液的阿拉伯胶树一般两眼泛滥。请你们把这些话记下,再补充一句说:在阿勒坡地方,曾经有一个裹着头巾的敌意的土耳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诽谤我们的国家,那时候我就一把抓住这受割礼的狗子的咽喉,就这样把他杀了。(5-2)

在这里,奥瑟罗把威尼斯称之为“我们的国家”,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倾向,尽管这个共

和国其实一直来把他当作异邦人和外族人看待。不仅如此,通过这番言谈,奥瑟罗还想再次表明自己与土耳其人的区别,就像他在拆开凯西奥与蒙太涅打斗时所说的。我们注意到,奥瑟罗在“土耳其人”这个词上,有意加上了三个具有文化种族身份区别性特征的形容词:“裹着头巾的”、“敌意的”、“受割礼的”,最后用一个动物性的意象“狗子”称呼之。从中可以看出,奥瑟罗具有多么强烈的文化身份意识,多么希望融入到威尼斯主流社会中去,多么想把自己与当时被称为野蛮人的土耳其人区别开来。可见,文化身份认同意识已经内化在他的潜意识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奥瑟罗像杀狗子那样把一个殴打威尼斯人的土耳其人杀死,也像杀狗子那样把杀死威尼斯女子的自己杀死,让台下的西方观众大大松了一口气。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很自然就冒出来了,莎士比亚究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还是一个反种族主义者?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很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加以回答。因为像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巨人一样,莎士比亚本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人格和多重身份的“变色龙”,他既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剧团股东,又是一个善于揣摩观众心理的演员和剧作家,当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他写作《奥瑟罗》前不久,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588),建立起海上世界霸主地位,它急欲建构一个文化上的“他者”,为自己的对外扩张做文本上的准备。莎士比亚通过演绎发生在威尼斯的战争与爱情的故事,以一支土耳其舰队和一个摩尔人的相继覆亡,满足了他的西方观众的愿望,迎合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从心理上解除了来自东方的“他者”的双重威胁。

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奥瑟罗这个“他者”形象,莎士比亚也对当时流行于整个伦敦社会的有关黑人的刻板印象提出了挑战,对以伊阿古为代表的种族主义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并且指出了种族主义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悲剧都是以主角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大多为国王、王后、王子、领袖或武士,也就是说,都是非同寻常之人,身处非同寻常之境,这正体现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的崇高的悲剧概念。莎士比亚将原小说中无名的摩尔人与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不列颠国王李尔、苏格兰将军麦克白并列在一起,使之成为有名有姓的悲剧英雄主角,正说明莎士比亚对这个高贵的摩尔人的同情和尊敬,体现出了一种伟大的,超越了种族、肤色和文化差异,包容一切的人文主义精神。

[参 考 文 献]

- [1] Alison Smith , Racism and Othello , Grade Save[EB/OL]. <http://www.classicnote.com/classicNotes/Titles/Othello/essay1.htm> ; 2002 - 06 - 03 .
- [2] 卞之琳 . 论《奥瑟罗》[A] . 卞之琳 . 莎士比亚悲剧论痕 [C] .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80 : 133 - 204 .
- [3] 方平 . 奥瑟罗考证 [A] . 方平 . 新莎士比亚全集 第 4 卷 [C]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1 : 628 - 636 .
- [4] 蔡文显 . 浅谈悲剧《奥瑟罗》的主题思想 [A] .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筹) . 莎士比亚研究 : 第 2 期 [C]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 1984 : 63 - 82 .
- [5] Catherine Alexander and Rebecca Brown , Othello-race , place and identity[EB/oL]. <http://www.shakespeare.org.uk/othello1.htm> , 2002 - 06 - 03 .
- [6] Bradley , A.C. Shakespearean Tragedy : Lectures on Hamlet , Othello , King Lear , Macbeth[M] . London : Macmillan , 1905 .

[责任编辑 徐 枫]

Othello : the Making of a Western “ Other ”

ZHANG De-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Shakespeare ' s tragedy *Othello , the Moor of Venice* , is an adaptation from the novel *Hecatommithi* written by G. Cinthio , an Italian author . The adaptation is not just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re , but involves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cultural power and textual construction , which includes three interplaying aspects as follows :

First of all , as some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 the protagonist in G. Cinthio ' s original text was presented just as an anonymous Moor . It was when he came into the play that the Moor was named Othello by Shakespeare , which is meaningful and allusive . Othello alludes to the Ottoman Empire , a constant threat to the western world at that time , and Thorello denotes a young bull in Italian (made of *toro* , bull , with a diminutive suffix *ello*) , reflecting both the racial discriminatory climate and the general fear of the age . Therefore , the playwright emphasizes the exiling condition the protagonist experiences as an “ other ” in Venice . For Othello , to win love and a good marriage means getting an identity on the foreign land and securing his inner peace . That ' s the reason why he says if he loses the love of Desdemona , the Venetian girl , “ chaos is come again ” .

Another important adaptation in the Shakespearean text is the change of the main scenes of the play from Venice , a center of the western world , to Cyprus , a marginal island between Europ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which was a nightmare to westerners . It seems that the playwright consciously reminded his audience of some parallels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scenes he confronts . When Othello lived in Venice he was civil , rational and showed high self-control , but having moved to Cyprus , he became crazy , rude , and even barbarous , which finally leads to killing his wife and himself .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s found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 In Cinthio ' s novel the Moor , having committed the murder , hid himself as a coward and then was arrested and sentenced to exile . Shakespeare manages , however , to let the protagonist to take his own responsibility , to “ speak of me as I am ” , and to commit suicide in public as a true hero .

Evidently the making of Othello as a text of others to westerners shows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 Elizabethan mainstream ideology upon the motive of the playwright . But Shakespeare , in a complicated operation and with his masterstroke , made Othello such a Western “ other ” character that catered to the ideology and the audience on the one hand , and yet on the other hand revised the popular stereotype of the African , and showed the broad nondiscriminatory humanist mind of the playwright .

Key words : Othello ; Other ; cultural identity